

试论许云樵在马新学术上的贡献

廖文辉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讲师)

摘要

许云樵乃著名自学成材的南洋史研究学者,著作等身,并多有创发。他逝世虽已二十余年,可是对他的研究,成果却显得稀疏,与其在马新学术界的耕耘和努力,似乎不成比例。本论文的目的在于希望能从外部考察来为他进行评价,并给予定位,进而一窥他在马新学术史上的贡献。许云樵的治学范围即广博又精深,并能通俗与学术兼备,且编译著注四项皆能。他尝试建立南洋研究的传统、建构马来亚古史的面貌、推动学术活动和研究不遗余力,并鼓励和培育后进,使马新的华文源流的南洋研究后继有人。当然,他孜孜以求、努力不懈、永不言弃的治学精神,以及爱护民族文化教育和不事敌奸的民族气节亦颇值称述,故于文中亦稍事阐发。

关键词: 许云樵、南洋研究、古史地名考据

An Assessment of Xu Yunqiao's Contributions to Academia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LEW Bon Hoi (Lecturer,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New Era College)

Abstract

Xu Yunqiao is a famous self-made scholar in the field of Nanyang Studies and has produced voluminous works considered as pioneering and innovative. He passed away more than 20 years ago but so far, not many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studies on his works and the results currently available are still too insignificant compared with his achievements which are highly regarded by academician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ssess the contributions of Xu Yunqiao i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Xu Yunqiao was a scholar of many talents and excelled in writing, edit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original text. His research works were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He was versatile as an academic scholar who could also write for the layman. He made relentless efforts in promoting academic research and establishing the paradigms of Nanyang Studies. He was also noted for his encouragement to young scholars. His perseverance in academic research, his love for his own culture and his spirit of nationalism are commendable and discussed briefly in this paper.

Keywords: Xu Yunqiao, Nanyang Studies, Archaeology of ancient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names

一、前言

郑子瑜在《椰阴馆文存》的序文里曾如此描绘：“自从张礼千、姚楠、韩槐准诸先生相继回国之后，留在新加坡的早期南洋学会会友，对南洋研究确实有斤两的，就只剩下陈育崧和许云樵两氏而已。这数十年间，不论欧美、澳纽或是日本的外南洋研究家，一到新加坡，不是想找许云樵教授，就是要找陈育崧先生来讨论问题，交换意见。”¹与许云樵同一时代的学者郑子瑜给予这样的赞许，绝非溢美之词，当许云樵在1981年11月17日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各中西日报都自动刊出先生逝世及殡葬的消息。同时，在19日，台北《中央日报》也以如下专电报道：“东南亚历史学者许云樵教授，因心脏病于昨天去世，享寿76岁。这位自学成功的学者于1940年创立南洋学会，定期发行《南洋学报》，刊登研究东南亚的文章。”在第二年的1月2日，晚上9时10分，新加坡电视台播映所拍摄的有关许云樵的新闻片，电视台播映平民去世的新闻片，在新加坡许云樵可谓是第一人。此外，南洋学会为了纪念创会人之一的许云樵，于《南洋学报》第37（1982）和38（1983）卷，连续两卷出刊许云樵先生纪念特辑，在这两卷的特辑里许云樵的旧雨新知和学生子弟分别撰文以为悼念。难能可贵的是在第37卷的学报，还特别刊载了一篇由许苏吾提供，不曾发表的遗作〈曼谷老教育家纪宏良〉，以作为纪念。这篇遗作是自许云樵25年前辞卸《南洋学报》编务以来的唯一一篇文章，意义非凡。

然而不无可惜的是许云樵虽贵为马新史学泰斗，但生前为生活奔波，难安于位，晚年则贫病交加，晚景凄凉乃至贩书求生。在他身后，除了报章的吊唁、讣词和广告，电台的新闻短片，南洋学会的纪念特辑，以及一些泛泛而谈的生平介绍文章而外，针对他的学术成果、贡献、地位等各方面进行学术探讨的文章，无疑相对贫乏，迄今为止也只有许苏吾、冯洋、崔贵强和廖文辉等少数几篇。1984年和1986年，许苏吾为了纪念许云樵先后撰写了两篇文章以为纪念，第一篇是将许云樵生前发表过的著作，进行整理，是为〈许云樵对学术研究的贡献——纪念许云樵教授逝世三周年〉，在《星洲日报·文化》副刊连载4期（1984.12.01、08、15、22），这是迄今为止对许云樵著述最完整的整理。第二篇则为〈许云樵的文艺创作〉，在《星洲日报·文化》副刊连载3期（1986.03.01、08、15）。中国学者冯洋在1980年代后期亦撰有〈著名东南亚史及华人史学家许云樵（1905—1981）〉一文。²较为晚近发表的则有崔贵强的〈许云樵：学识渊博的史学家〉³以及廖文辉的〈试论许云樵在马新史学的地位与局限〉⁴和〈试论许云樵的乾嘉朴学传统〉⁵二文。

1 郑子瑜，〈椰阴馆文存序〉，载许苏吾编，《椰阴馆文存（第一卷）》，新加坡：南洋学会，1985，页x。

2 载《南洋问题研究》，第一期（总53期），厦门：厦门大学，1988，页93—99。

这样疏落零星的研究成果，与许云樵的等身著述及其在马新学术界的耕耘，实在不成比例。所幸在2004年，马新著名的学者郑良树教授召集了一个以他为首的许云樵全集编辑委员会，负责整理收集许云樵的著述，并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出版。另外新纪元学院也正在进行许云樵来往书信的校注整理，并准备出版。许云樵的研究以及资料的整理，逐渐被学界注意，本文之作的目的即希望可以在这方面的研究略献绵力，以作为讨论的试金石。本文的切入点主要是从外部考察来透视一个学人如何透过其努力不懈和始终如一的精神为马新学术界贡献他的耕耘成果，这成果不仅仅是他的研究著述，也涵盖他的学术活动，并由此来观察他对马新学术研究的推动和影响。由于人格特质与学术成就互为表里，相互作用，所以本文将两个面向，即人格精神和学术成就来探讨许云樵在马新华文源流学术界的贡献，希望能藉此给予他一个较为公允的评价。⁶

二、人格精神

许云樵的人格精神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为其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如一的治学精神；二为其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表率。

（一）治学精神

繁林曾有一短文如此称道许云樵的治学精神：“面对学习知难而进，因此而自学，实践了‘自强不息、力争上游、自力更生’的南大精神所指的精神，他的非一般的成才历程，很有力也很明晰地说明了的，是南大精神所指的精神”，并誉之为南大精神的体现者。⁷将许云樵的治学精神提高至南大精神的具体呈现，或许不无可议，但文中所言许云樵之治学精神，却实如所言，半点不虚。据马新著名史家颜清湟回忆：“记得有一次我乘许教授的汽车到市区去，我和他都坐在后座，他很少谈话，只是忙着校对稿件。他似乎在掌握每一分钟，不让时间浪费。他那种献身学术的精神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对我以后走上学术界的道路有着相当的影响。”⁸李业霖曾谓许云樵书房中的灯火是南大校园里最迟熄灭的。我想这些恰好可作为繁林一文脚注。

他这种孜孜以求的治学态度，其来有自。许云樵年少时曾经历家道中落

3 载何国忠主编，《承袭与抉择：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文化篇》，台北：中研院，2001页，131-175。

4 载何国忠编，《百年回眸：马华文化与教育》，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5，页143-161。

5 载陈鸿瑜主编，《海华与东南亚研究》，台北：翰芦，第4卷，第1期，2004，页71-92。

6 至于学术内部的考察，如南洋古史地名考证、史料文献学、华侨华人等研究领域是否有独特的创见或开风气之先，则有待另文处理之。

7 繁林，〈天窗亮话：许云樵与南大精神〉，载《南洋商报·商余》，2003.04.21。

的遭遇，在他12和14岁那年，父母相继过世，家产为兄长所夺，只好与外祖母相依为命，寄人篱下，孤苦伶仃，生活困难，以至营养不良，体弱多病，但这并不阻挠他向学的心志。他在英华学校上课时，每节50分钟，课毕休息10分钟，课毕学生莫不争先恐后到体育场及大礼堂去玩乐，许云樵除了“解手”外，足不出户，独自在课室里，翻读《康熙字典》以及古籍，乐此不疲，十年如一日。其二，每年学校三个月的暑假，许云樵必组读书会，邀同学参加，拜宿儒为师，课程由师生协定，有《春秋》、《毛诗》、老庄哲学和诸子百家杂抄等等。其三，每至寒暑假的大考前，必迁居至其谱弟之家，彼此切磋，互相督促，往往至通宵达旦而不以为苦。其四，许云樵高中毕业后。振声中学请其留校执教，他一面为母校教学，一面进入国学专修馆奋发自修，刻苦自励。⁹其五，在大学期间，许云樵每天借四本线装书回宿舍研读并作札记。凡看过的皆能记得，甚至能指出谋书某页有什么资料，为他奠定了一个做考据的基础。¹⁰许云樵在中学毕业后除了留校任教，并刻苦自学，同时在亲友的资助下，入读东吴大学，不久后转读师范大学及中国公学大学部。他积极争取读书，也不放过任何读书的机会。最后因为经济困厄，难以为继，只好被逼辍学，前后只完成了两年的大学课业。其用功之勤，为学之力，于其求学时代已见端倪。虽然中途辍学，然而他并未放弃求知的努力，并在南来后走上了南洋史地的研究，终靠一己的努力，自学成才，成为马新南洋研究的著名学人，并在国际学界小有声名。所以朱杰勤谓之为“是一个自学成材的好榜样”。¹¹

许云樵南渡后，生活始终难以安定。在战前为了糊口曾经南来北往，先后于柔佛新山宽柔中学、新加坡静芳女子师范学校、北大年中华学校和泰国曼谷国立商科学院担任教职，最后辗转回返星岛，出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蝗军南侵，曾数遭盘查问话，东藏西躲，险遭不测。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改行和友人合营土产进出口生意以维持生活。光复后曾在陈育崧的南洋书局服务，编撰期刊杂志。1948年，脱离南洋书局，与上海的同乡朋友合资创办新加坡印铁制罐厂，出任印铁厂的董事经理，从事南洋仅有之新工业。结果十年后惨遭亏损，不得不结束营业。那时，许云樵年事渐高，已近退休之龄，在事业上可谓一事无成。所幸在其印铁厂结束营业前一年，他获得刚于1956创办的南洋大学的聘约，邀请他担任史地系的教席，并授予他副教授之职衔。这是他二十多年来在南洋史地理首苦干的开花结果，多年来的努力终于获得认同。但好景不长，他仅任教了短短的四年，因为不愉快的人事纠纷，加上可能在南大改制上发表反对意见，不为当局所喜，只好黯然神伤的离开他最理想的栖身地。往后

8 颜清煌，〈悼念吾师许云樵教授〉，载《南洋学报》，第37卷，第1、2期，页49。

9 许苏吾，〈青少年时代的许云樵〉，载《星洲日报·文化版》，第84期，1985年11月9日。

10 许云樵，《文心雕虫》。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1973，页172-173。

11 朱杰勤，〈许云樵与东南亚研究〉，载《南洋学报》，第38卷，第1、2期，页75。

他虽被聘为义安学院校长室秘书兼史地教授，最终因为他对义安学院的改制颇有微言，再加上连续发生了好几次的车祸，身心实在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创伤，步履维艰，身体状态日差一日，最后不得不选择退休，始终未能在学术机构里如愿的安身立命。许云樵离开南大后曾于美华树胶有限公司服务，担任研究室主任一职。离开义安学院虽然已年过花甲，垂垂老矣，仍然要为生活奔波，服务于森都公司、翻译《世界发明史》、撰写专栏来糊口谋生。

许云樵有一段自白，很形象描绘了他的这份不确定感：“我自南来迄今42年中，此身常似水上浮萍，随风飘荡，深深地感受到没有安身之处的痛苦。42年来没有一天能到真正的心身安泰。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不是给服务机关炒鱿鱼，便是居停主人下逐客令，永远栖栖遑遑不得安宁，甚至躬逢其盛，尝到三年另八个月的沦陷时期，不安定中加上不安。近五年来，我虽以退休之身，无鱿鱼可炒，却给二竖交攻，成名副其实的东亚病夫。我虽没有犯法人监牢，却因车祸折臂断腿而被留在医院内两个月，又因左目失明，两度开刀，留院三个多月，再因舌上生癌，大动手术，又把医院作旅馆，侥幸得蒙天恩化险为夷，最近方欲额首称庆，不料那犹太居停突然大下逐客令，正使牵了一大群大小浮萍的我，彷徨失措，走投无路。”¹²

更有甚者，他的研究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安枕无忧，反而历尽波折。当许云樵在南大主持南洋研究室的工作，准备将其收集整理多年有关东南亚研究的华文图书文献资料编写成《南洋文献叙录长编》发表于其主编的《南洋研究》年刊第一卷时，却被讥刺为书目整理算不上是研究，不拟刊载。最后事情虽得以解决，他的长编也得以刊行，但对他而言无疑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他离开南大后，自创“东南亚研究所”于其位于麦波申路（Macpherson Road）167号3楼的寓所，目的在于推动东南亚研究，出版期刊和丛书，并奖掖后进，尤其是异国学者，慕名求见者不绝。那时的南大校长庄竹林博士要禁止他使用该名堂，因而双方大打笔墨官司。

晚年许云樵的身体状态每况愈下，日见单薄。除了祸不单行连续碰上好几次的车祸，使其肢体蒙受损伤，脆弱的躯体百上加斤。更为糟糕的是，他不惜损伤己身，焚膏继晷，在没有任何研究助理的情况下全力以赴，磨夜点校《清实录》，爬寻《清实录》里有关东南亚史的资料，由于眼力过度疲累，导致左目网膜破裂，并且突告失明，遂入中央医院治疗，蒙眼科专家蔡瑞金女医师施手术，悉心治疗，方得痊愈出院，稍愈仍要坚持完成计划。未料3个月后，偶一低头，再次伤及眼睛，再入中央医院医治，情况方得好转，然而却严重损伤视力，从此眼力衰退，点校工作只好被逼停顿。¹³这大概是由于许云樵长期不间断的读书作研究，皓首穷经，埋头古籍经传，耗用眼神过度，又没有适当

¹² 许云樵，〈安身之处〉，载氏著《文心雕虫》，页170。

的照顾，终于在他点校清实录时左目突眇，两施手术。

然而，不久后，许云樵经检验查证后患上舌癌，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虽然经过了连日的放射性治疗，并在悉心的疗养下得以复原，但仍难免复发之虞。连续不断的病痛折磨，严重影响了他正常的研究工作，同时为了与癌症搏斗，他一头栽进了传统中医药的研究。加上生活逼人，也接了好一些的图书编辑和翻译的工作，反而他的南洋史地的研究被搁置一边。这也是为何他晚年浩大的《清实录》点校工作没有完成的原因。这段时间他本拟以新观点撰著《东南亚通史简编》，由于撰写途中，眼疾突发，加上生活不安定，时缀时作，最后他仅完成了3篇共7章的文稿，其余的是否有继续完成，则不得其详。¹⁴

在他左目失明进院治疗之前，他曾与新加坡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饶宗颐教授展开了一场轰动马新学术界的学术论战，即新加坡古名“蒲罗中”问题的讨论。就在问题告一段落后，陈育崧突告加入战围，为文驳斥许云樵的观点。当时许云樵眼疾突发，未能及时回复，但他念念不忘陈育崧的文章，时欲撰文反驳。经过几个月的调养后，马上答复陈文，“蒲罗中”问题的争论才正式落幕。这可以看出他对学问的认真和执著。在论争期间，饶宗颐举证论辩许云樵错读《太平御览》，以致将人名梁祚和书名的魏国统连在一起。许云樵即刻复文承认错误，他说：“关于第一点，我万二分感谢饶先生的指正，同时完全接受他的意见……虽然，我为谬本所误，但我实难辞疏忽之咎……我因对这一冷僻的佚书未加注意，以致貽笑，可见治学的不易。在这里，我再正式向饶先生道谢，拙作再版时当予更正。”¹⁵这里可见许云樵并非一意孤行的坚持己见，只要是证据确凿的错误，他都乐以接受并给予纠正。这是他在治学上勇于认错改过的精神。¹⁶

整整半个世纪，许云樵用了他生命中的50年持续不断的治学读书做研究，不论环境如何，始终如一，未尝稍歇。他将大半生的生命奉献了南洋研究，燃烧他的生命来建构南洋研究的传统。但他的研究历程一路走来并不平坦，除了南大和义安的那几年，他并无一良好之学术研究环境，他需养家活口，为五斗米而折腰。为了让他编著的专著和期刊得以出版，他需四处张罗经费，以维持其研究工作。¹⁷在他的晚年，经过车祸、眼疾、舌癌的打击后，同时又患上心脏病、风湿痛、关节炎等疾病，本应休息，但仍然拼命工作和研究，燃烧其生命之最后一刻，奋战到底的治学精神，实在令人敬佩。¹⁸所以吴振强赞叹的

13 1970年春，他应前南大校长黄丽松博士之请，为检摘《清实录》中的南洋史料，并加以注释和索引，便日夜埋头工作，数月之后他的左目便告突眇。详见许云樵，《清实录及其南洋资料之整理》（出版资料不详）。

14 见许云樵与王纪元志期为1973.06.09、1974.01.05、1974.01.21、1974.02.04、1974.02.21、1974.04.05、1974.04.21、1974.04.29、1974.08.05、1975.01.29、1975.03.05之来往书信。
廖文辉、曾维龙纂注，《许云樵来往书信集》，雪兰莪：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

说：“许教授毕生献身于学术和文化事业，除了日间在外办公外，每晚回到家里，仍然孜孜不倦的从事研究和写作。许教授勤于治学的态度，用上‘数十年如一日’这句老话来形容，一点也没有夸张。”¹⁹

许云樵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在生活条件、研究工具和财力物力的重重限制下进行的。但他却凭着惊人的精力和毅力，持续不断，坚持到底的精神，以相当频密的速度，将一篇又一篇，一本又一本的著述，不停的发表，以丰富华文源流南洋研究的传统。处于这种外在和内在研究条件不足的情况下仍有如此庞大的学术成果和研究贡献，委实令人惊叹不已。

（二）民族精神与个人气节

许云樵南来之初，先后任教于柔佛新山的宽柔学校，新加坡的静芳女子师范学校；后应友人吴学濂之邀请，前往暹罗北大年中华学校主持校务，前后共3年。由于暹罗政府大事排华，强迫华校改授暹文，以暹语为媒介语，否则加以封闭，逢此巨变，他马上辞去中华学校职务，至曼谷国立商科学院教授英文。此时，暹罗的华校支离破碎，此情此景，睹状心伤，写成了一篇〈暹罗教育及暹罗华侨学校〉的长文，评述暹罗教育的史乘及概况，叙述暹罗政府摧残华侨教育的背景及得失，寄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发表。比及1938年因为銮披汶(Pibun Songkhram)掌政，雷厉风行排华政策，强行关闭华校，极力摧残华校的生机，他只得收拾行囊，离开曼谷国立商科学院，挈眷回返新加坡。

15 许云樵整理，〈蒲罗中问题论战辑录〉，载《东南亚研究》，第六卷，1970，页49-50。

16 这里再举一例证以为补充，在一封写给许云樵但署名无法辨识的信函（1972年3月27日）中，指出许氏的专栏《文心雕虫》其中一篇文章〈可数与不可数〉内的一项笔误，并盼其在结印成书时加以订正，许氏果如其言，在《文心雕虫》结集出版时加以修正。

17 为了筹措东南亚研究所的各项出版经费，许云樵曾修函李氏基金会请求资助，1963年12月20日的信如是写道：“明春拟刊为东南亚研究丛书及学报，并展开研究事业……乃者樵苦斗二年而梦寐求之，冀得实现者，望博士大力将伯助之，则非仅敝所之幸，亦学术界之大幸也。”1971年7月7日的信如是写道：“谨启者，敝所编印《东南亚研究》历年来蒙鼎力支持……尚望先生一本初衷，继续支持。按第七卷印费需叻银三千元，伏希慨助其半，俾得腋集易成，是所深禱。”此外，他也向友人寻求赞助，1972年3月7日的信如是写道：“子亮先生道席：月前命小儿持函拜谒，为敝学报作将伯之呼。蒙仁者慨重季布之诺，愿赐叻币五百以助印费，高谊隆情殊深铭感。”详见廖文辉、曾维龙纂注，《许云樵来往书信集》，页311、324。

18 在许云樵晚年的来往书信，常常会触及他因晚景的病痛和经济问题而影响他的研究工作。1975年1月29日致王纪元的信如是写道：“去年来我因家庭负担沉重，经济发生重大困难，以致我对《东南亚通史简编》的编写时缀时作，极为缓慢。”1975年3月5日至王纪元的信亦写道：“承询《东南亚通史简编》今年能否脱稿。我很抱歉去年由于生活不安定而延搁，今年我已有一份工作，可使生活安定，年内脱稿，必无问题。”这种话语在许云樵珍藏的来往书信中屡见不鲜，这里仅举二例以概其余。详见廖文辉、曾维龙纂注，《许云樵来往书信集》，页171-172。

1950年代初期，陈六使慷慨捐助五百万元呼吁兴办华文大学，在福建会馆献地的带动下，马新一区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创办南洋大学的运动。这时许云樵为了表示对南洋大学的支持，撰写了〈南洋华侨与大学教育〉一文，发表于《南洋学报》，除了详述1950年代以前马新的华侨教育发展的情况，也表达了他对南洋大学的期望，首先，南洋大学是民族精神的寄托；二，南洋大学是华侨教育的塔顶；三，南洋大学是本位文化的中心。同时他更殷切的希望南洋大学能“以研究南洋和华侨的一切为职旨”。²⁰当南洋大学正式开办后，许云樵受聘为南洋大学史地系副教授，开设《马来亚史》、《东南亚史》、《东南亚地理》等课程，并兼任南洋研究室主任。但他只任教了短短的四年，因为人事的纠纷，只好黯然的离开南洋大学。²¹

1964年，新加坡义安学院正式成立，招生开课。义安公司是新加坡潮州人的机构，资产雄厚，热心创办教育，公司负责人有鉴于当时社会的需求，所以创办了义安学院。创办时设有三个部七个系，即语言部的中国文学系、马来语文学系；商业部的商业管理系、会计系；工艺部的应用化学系、电讯工程系及家政系。许云樵随即被聘为校长室秘书兼史地教授，同时也负责编辑院刊。1968年，由于车祸致使许云樵折骨断腕，再加上义安学院迁址改办为工艺学院，遂结束了在义安的教学生涯，宣告退休。

在许云樵零落的教学生涯中，不难发现除了1930年代，因不满暹罗政府排华政策而转至曼谷国立商科学院教授英文外，其余皆在华校教学。他数次从教育岗位上退下，都和华文教育被摧残和教学媒介语文改变有关。从以上的整理或多或少可以看出他对华文教育的执着和热爱。²²

1941年12月8日，日本蝗军由马来半岛北部兵分三路，向南挺进。此时马新的华人在南侨总会领导下动员起来，许云樵也参加了文工团投入抗日的工作行列。1942年初，日本蝗军南下，新加坡失守在即，这时有人向他鼓吹：“现在援军已到，战局已好转，应当在敝党的领导下，一致动员作英军的后盾。”并且在报章上发表新闻，同时将他的名字列在里面，这是为何他被日本宪兵部列入黑名单的原因。2月17日起，日本为了肃清所有的抗日份子，实施了三次的大检证。此时他先后两次被传诏检证，但都吉人天相，逃过劫数。他为了保全藏

20 许云樵，〈南洋华侨与大学教育〉，载《南洋学报》，第九卷，第二辑，1953，页17-18。

21 许云樵性好集邮，数十年来乐此不疲，收集了各国珍贵邮票13本，视如命根，其中分国贴为四万余枚成套的珍品，最完整的是中国、泰国、马来西亚和日治时期的收集，还有首日封、大全张和各种零星插散的不计其数。不料有一天所有的邮票竟然在南大宿舍里遗失，不知所踪，在多方侦察之下，赫然发现竟为某同事之儿子偷去，几经交涉，皆不得要领，只好报警查办。某同事矢口否认，并且脑羞成怒，向大学当局投诉，指责许云樵兴风作浪，惹事生非，引起大学的不满，埋下了后来被解雇的伏线。

书、南洋学会的文件和学报，把住所的天花板造成两层，将书藏在两层天花板的中间，有如夹心饼一般，瞒过了搜查。后来，日本军政府要把文人和抗日份子等罪同办，他的同居朋友成为汉奸，将之出卖，身份曝露，只好奔波逃命，几经迁徙躲避，才得以化险为夷，躲开敌人的监视，而保存了性命。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他改行和友人合租一艘两百吨重的机动木船，合营土产出入口生意以维持生活。这期间，他接受了一位潮州商人以一千元入股，当他将钱存入银行时，因为一张十元伪钞而被调去宪兵部问话，后来证实他委实不知情，故安全被释放。日军的军政监部内设有一调查室，除了日本学者，也集合了马新的学人，如叶华芬、陈育崧、韩槐准和许云樵等人，欲进行南洋的研究工作，并策划出版《南方杂志》。许云樵被推举为杂志主编，现场既不便推辞，因此他决定采行拖延政策，借故不与当事人恰谈办杂志的事宜。如此一拖再拖，最后调查室因部队调动，也随着被调往苏门答腊，《南方杂志》的计划就此告吹，许云樵也就可以置身事外了。1945年4月，许云樵被叫去“特高部”协助查证陈憨生偷听情报之案件。几经查问皆不得要领，最后只好将陈憨生的供词一条条的询问许云樵是否曾听闻，前后共数十条之多。凡是不是重要或已实现的，他都承认听过；反之情形严重并且会加重其罪名的，一概加以否认或说想不起。最后不了了之，只好将他释放。²³

上述根据许云樵回忆文章整理资料显示，他在日军南侵前曾经参与了马新的抗日活动；在日治时期经历了两次大检证、成为日本宪兵部的黑名单之一、被汉奸出卖东藏西躲；在日治后期曾一次被宪兵部传诏问话，一次被特高部传去协助查案。为了保全性命曾经伪装身分；为了保全图书文献曾经夹藏书籍；为了不使更多人受害，他在供词中尽量给予开脱；为了不替日军服务他敷衍拖延。这都表现了他不事敌奸，不出卖民族的情操。他这股抗日的民族节操在战后继续发酵，透过对日据史料的整理，以文字和图片揭露并保存了日军这段可耻的历史。

1946年10月，许云樵主编的《南洋杂志》创刊号出版，最弥足珍贵的是刊载了十几帧检证期间日军大屠杀的图片，反映了日军的惨无人道。这些照片都是用质地良好的光面书纸印刷，画面非常清晰，也是第一次对日军暴行实况照片的公开发表。而这批照片是许云樵的一位朋友从“大日本宪兵队本部”悄悄弄到手的，这位朋友也因此事后丧失了性命。所以许云樵在〈编余拾零〉感慨的说：“我们在刊出这些照片时，除了为被检去的数万同胞致哀外，也要为这位‘有心’的好友致敬！”²⁴此后，在第一卷第六期，他又刊载了多幅与

22 他离开商学院，是因为暹罗政府强迫关闭华校。离开南大和义安，不仅仅是人事或车祸，其背后的原因可能与他不同南大和义安改制有关。关于此点，笔者曾听闻他曾经以笔名在《中国报》发表他对南大改制的看法和表达对改制的不满，或许因此招致校方的不快而借机将之辞退。此事是非曲折如何，仍有待进一步探寻和疏理史料，这里仅能附论于此。

大检证有关的文章，同时也以其所见所知写了一篇〈昭南时代检证大屠杀案始末〉，以为历史见证之长篇实录。在共2卷16期的《南洋杂志》，他除了本身执笔撰写回忆文章，揭发日军的暴行，也刊用了好一些相关文章。1955年6月，许云樵主编的《南洋学报》第十一卷第一辑出版，此卷最大的特色就是没有任何的学术论文刊载，仅有一分由许云樵整理的〈马来亚华侨殉难名录（附引言）〉。这份名录是许云樵在战后，透过各种管道和资料陆陆续续整理出来的，共得7560人。²⁵后来，为了编辑《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又再根据新加坡华侨被检屠杀害集体鸣怨会所调查的记录，和各地刊物中的记载加以补充，共得八千六百余名，以附录的形式，发表于《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

²⁶

《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的编纂，主要是根据庄惠泉经年累积的资料编成的，这些资料包括光复时接收的珍贵文献，以及一三六部队所存的档案等等，在1970年代初期委托许云樵着手编纂。在编纂的过程中，可谓一波三折，在编日据时代的史料时，由于某些史料对当政者不利，所以曾引来有关当局的干涉。其次，书未出版，两人竟已先后辞世，后改由蔡史君接手。²⁷

三、学术成就和贡献

许云樵的学术贡献主要可以如下三个面向来了解，即编译著注四项皆能、对马来亚古史的建构以及对后进的培育。

（一）编译著注四项皆能

1. 广博、精深与通俗文章的多面手

朱杰勤在〈许云樵与东南亚研究〉一文中曾说：“许先生不仅精于东南亚史地学，对于文学亦有湛深的造就，有《希夷室诗文集》问世。他对于医学和药理学亦有研究，并有著作出版。可谓一专多能的大才了。”²⁸许云樵学问之驳杂，从其留下的文字，可概见一二。他的治学领域涉及面大，除了专长的南洋史地和音韵语言、也包括了传统医药、史学与文献、民俗宗教、邮票和橡胶等等。对此，崔贵强作了如下的评语：“总之许云樵的学问是驳杂的，牵涉到各个层面，经济、货币、邮票、宗教、地理、教育报业、医药、语文及音

23 许云樵，〈昭南噩梦录〉、〈《华侨研究》几乎砍头〉，载氏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页443-449，477-478。

24 许云樵，《南洋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46年10月，页13-19，31。

25 许云樵，《南洋学报》，第11卷，第一辑，1955年6月。

26 许云樵，〈马来亚华侨殉难名录〉，载氏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页968-

韵，无不包罗在内……”。²⁹广博方面除了治学范围的广度外，也反映在他的通论性著述上面，他除了写《马来亚史》、《南洋史》，也曾于《南洋年鉴》发表40万言的东南亚华侨史，晚年也草就《西马来西亚各州华族拓殖史》等通论性的著述。或许可将以上三部著述和一篇长文视为他在东南亚史研究上的四部通史性质的著述。《西马来西亚各州华族拓殖史》或许略嫌单薄，但环顾以中文为书写媒介的东南亚和中国史学界，能在有生之年，著有东南亚史、马来西亚史、东南亚华人史、马来西亚华人史四个通论性领域的学者，可谓绝无仅有。

除了广博，精深细致的研究更是他驾轻就熟的拿手好戏，写了许多古史考辨之文，如《大泥考》、《丹丹考》、《赤土考》等是；专精方面除了史地考据文章外，也反映在专门学问的研究上面。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许云樵曾写过一部《南洋邮票史》，原稿寄香港商务印书馆印行，可惜战争爆发后弄至图稿尽失。战后许云樵用英文著述马来亚沦陷时期的邮票图鉴，³⁰并且发表了多篇邮票研究的论文，这些文章汇集起来，足以出版专书而有余。由此可见，许云樵还是一位邮票专家。再者，他晚年因为患癌，而一头钻入的传统本草医药的研究，也留下了好一些文字成果。

他除了能写精深的学术论文，亦能以生花妙笔书写通俗的文章，即使有些学术性的文章他亦能用浅白的笔触书写。他把浩瀚的史料，学者的考证与复杂的史实加以消化之后，用自己的文字写出来，而《西马来西亚各州华族拓殖史》既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他成功的将一个题目大、范围广，且史实模糊不清的历史，以一篇长文提纲挈领交代清楚。所以崔贵强称许的说：“他的古文根基结实，白话文也如行云流水，十分顺畅，结构的条理分明，读起来兴趣盎然，很容易为读者所接受，因此他对历史教育的普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³¹此外，他尤长于人物传记的撰述，在《星洲十年》里，他为新加坡十名华侨先贤立传，并在书后写有《胡氏事业史略》，写来翔实生动，极富特色。在《马来亚丛谈》里，有关侨领的趣闻，遣词用字，深入浅出，趣味盎然，引人入胜。³²所以柯木林写道：“这本书，以轻松趣味的笔调，撰述新马华人史迹，可读性甚高。无可否认的，《马来亚丛谈》引导我进入新马华族史的研究领域。”³³

2. 期刊杂志、诗文丛书的编辑

许云樵除了著述等身，同时也能兼及编辑、翻译和注辑，并且也颇有

27 许云樵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之《代序》和《出版缘由》，页i—iii。

28 载《南洋学报》，第38卷，第1、2期，页75。

29 崔贵强，《许云樵：学识渊博的史学家》，载何国忠主编，《承袭与抉择：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文化篇》，页161。

小成。1939年许云樵应《星洲日报》之聘，任职于《星洲日报》报社，与张礼千、姚楠等人参与《星洲十年》的编辑工作。这是本近百万言的年鉴性书籍，卷帙浩繁，资料丰赡，内容以新加坡为主，旁及马来亚，分政治、市政、经济、文化和社会5篇，末附新加坡120年大事记及《胡氏事业史略》。对马新重要学术机构，当地有贡献的华人事迹、名胜古迹及风俗习惯辟有专章详述，是研究战前马新史不可多得的书籍。《星洲十年》出版后，许云樵仍然留在报馆内继续服务，负责有关南洋副刊的编务工作。《星洲日报》的两种副刊《南洋史地》和《南洋经济》在他们三人的合作下终于诞生了。它们都是双日刊，轮流出版，许云樵主持《南洋史地》，张礼千主持《南洋经济》。不久后，报社把《南洋史地》和《南洋经济》合并为一，日出一期，改名为《南洋文化》，仍然由他们三人负责。在这些副刊刊载过的文章，有好一些是有相当代表性的学术著述，其学术水平为国内外人士所公认。³⁴

南洋学会成立后，他众望所归被选为学报主编，先后编辑过13册的《南洋学报》，在他主编下的《南洋学报》，成为本区域顶尖的学术期刊，海内外皆称颂。在这段期间他也进入南洋书局，负责《马来亚少年报》和《南洋杂志》（1946年10月创刊）的编务，前者的对象为青少年，每月两期，每期销量达两万份，很受欢迎，影响了当时的一辈青少年。马新一些著名学者如马汉、梅井等人少时皆是《马来亚少年》的读者，对他们走上文史之路起了一定的影响。³⁵后者多以南洋的历史社会为主题，通俗与学术并重，它保存了大量研究东南亚各国历史文物及社会情况的珍贵资料，是研究南洋社会以及文物不可或缺的杂志。虽然以“杂志”为名，但为文撰稿的都是当时南洋研究界数一数二的学者，如许云樵、张礼千、陈育崧、韩槐准、姚楠、许苏我和朱杰勤等人，所以里面刊用的文章皆有一定的水准，有者还是一时之选，对南洋研究的推动，不无贡献。以上三份刊物，可说个别代表了三个不同层面，《南洋学报》是属于学术层次的刊物，《马来亚少年报》则代表了青少年的通俗读物，而《南洋杂志》则在两者之间，通俗与学术并重。

除了上述三种期刊杂志，许云樵也于1959年和1965年分别编辑出版了《南洋研究》和《东南亚研究》期刊两种。前者是许云樵在南大任教时编辑出版的，都50余万言，厚达400页，译著的论文共10篇，书评两则，除了一篇为外稿，其余皆为南大师生的作品，他的《南洋文献叙录长篇》也发表于此。但不无遗憾的是，《南洋研究》只出版了一卷就告寿终正寝，未能继续出版。许云樵离开南大后，以其住家成立了东南亚研究所，并连续出版了7卷的《东南亚

31 崔贵强，〈许云樵：学识渊博的史学家〉，页154。

32 同上，页158。

33 柯木林，〈记许云樵教授〉，载《南洋学报》，第37卷，第1、2期，页42-43。

34 姚楠，《南天余墨》，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页51。

研究》期刊，继续推动南洋研究的工作而努力。

从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从早期在《星洲日报》编辑南洋研究副刊开始，许云樵就不曾间断，努力不懈的透过出版期刊杂志来推动南洋研究。但可惜的是，这些期刊杂志除了《南洋学报》以外，皆因为他的离去而无以为继，不能长期坚持。

期刊杂志编辑之余，他也编辑了好一些丛书。战后，陈育崧的南洋书局恢复营业，其旗下的南洋编译所特聘请许云樵编译及校注南洋研究丛书，称《南洋珍本文献》，计划要出11种。许云樵译注之《新加坡风土记》和《佛罗利氏航海记》二书先行出版，其他9册分别是《槟榔屿志》，清力钧著，叶华芬注释；《兰芳公司历代年册》著者佚名，根据荷人原本影印，陈育崧考释；《海岛逸志》清王大海著，张礼千考释；《开吧历代史记》，著者佚名，许云樵根据三抄本校注；《苏鸣岗》，苏鸣岗为噶喇吧首任甲必丹，传本为巫文；《连富光传》，连富光为红溪惨案时代之甲必丹，本传亦从巫文译来；《宋卡纪年》许云樵译注；《西南夷风土记》，明朱孟震著，许云樵校注；《华侨文献秘辛》，陈育崧辑录。就在以上各书有待编印出版时，许云樵却突然辞去编务，致使其他各书无由面世。至于《宋卡纪年》和《开吧历代史记》则分别刊载于《南洋学报》之第8卷第1辑和第9卷第1辑。

1960年代，许云樵在南洋书局的名下，先后主持出版总共12种的亚非丛书，内容主要以东南亚地区的民族文化风俗历史为主，这些丛书计有：梅井《马来亚风情画》、叶钟玲《暹罗散记》、廖建裕《印尼散记》、吴景宏《中菲关系论丛》、吴景宏《菲律宾简史与人物》、刘子政的《砂罗越散记》朱飞《金沙江风物外纪》、梅井《马来亚的兄弟民族》、许云樵《马来亚丛谈》、许云樵《天竺散记》、吴景宏《菲律宾散记》，及卢伟林《缅甸散记》。

晚年，他也编辑了好一些书籍，但此时他所编辑的主要是中医药和诗文方面的书籍，已不完全是他念兹在兹的南洋研究。首先，在1976年为其亡友胡博渊整理与出版一本32开，约150页的回忆录《晓晴斋散记》。接着接受老友黎宽裕的委托，整理与校注其令尊黎伯概医师的遗著《医学文澜》成为一16开本，300余页的《黎伯概医海文澜辑注》，并写了一万余言的引文，介绍此书，引经据典，评述中医药的发展和效用。1977年7月，继校注《医学文澜》之后，又再接再厉将黎伯概医师的诗文遗作，从杂乱的遗稿中整理编辑成一本24开，200余页的《黎伯概诗文集》，并在书前为序加以介绍。在完成黎伯概医师的医学和诗文集后，他的声名大噪，很为中医学界看重，新加坡中医学术研

35 陈云清，〈曾松华：笔下说文化〉，载《光华日报》，2003.02.07；马汉，〈陪伴我们成长的少儿刊物〉，载《南洋商报·商余》，2003.04.18。

究院特别敦请许云樵担任永久名誉顾问。1978年，开始协助新加坡中医学术研究院编撰《传统中药展览目录》，这是一本中药物名称中英对照的书籍，24开本，共400余页。1979年4月6日—5月5日，在许云樵的推动促成下，新加坡中医学术研究院与新加坡国家博物院合办传统中药展览。展览期间，许云樵之《传统中药展览目录》也在展览期间售卖，一时洛阳纸贵，初版售罄，再版预约者众。1979年底，许云樵以风烛残年之躯，为其亡友张瘦石教授编印遗墨展览目录册。

除了上述有关中医药书籍的编辑和校注以及为人作嫁妆的诗文集的编辑整理工作外，许云樵晚年较为重要的，并与本身学术研究领域有关的编辑工作有如下三项：首先在患癌期间，抱病为中国学会编辑《30周年纪念特刊》，并于1975年出版。书中刊载了他两篇长两万余言的长文，其一是〈评黄谨良泰文译注中国载籍中之暹罗〉，另一为〈评陈存仁三保太监七次下西洋考〉，这是许云樵有关南洋研究论文最后发表的两篇。其次，他协助庄惠泉上校整理日据时代收集所得之资料，编辑成《新马华人抗日史料》。此书厚达千余页，除了收录文件、档案及专论外，也收集了一般民众的回忆录。书内有好多是别的书上找不到的珍贵史料，是研究现代史，尤其是东南亚华人抗日建国的史实所不可少的参考资料。³⁶其三，则为《希夷室文集》的出版。在1979年，许云樵将自身的诗文，连同以前在各刊物所写的发刊词或书本的序文等等进行集辑出版，名为《希夷室文集》。这些诗文是他在这50年来，于平日起居将其感触或遭遇写下而成的，同时加上注释和注明日期，此书为非买品，仅印50本作为赠送之用。这是了解许云樵诗文创作以及史学发展概况不可或缺的出版品。

除了期刊杂志，许云樵也搞出版社，编印与南洋研究相关的著作。在光复初期他与朋友合组华侨出版社，编印《华侨生活》与《华侨经济》等周刊，并出版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和《中国之命运》等书。同时也计划出版《南洋文库》丛书，但只出版了三种，后来因为环境关系而没有继续下去。

从以上的论述，可将许云樵的编辑工作归纳为如下三项，第一项是期刊杂志的编辑，从早期的报章副刊，到后来的学术期刊杂志、丛书的编辑都属这一项。其内容以南洋研究为主，偏于学术取向，但也曾编辑通俗读物如《马来亚少年报》来推动青少年对文史的兴趣。其次是专书和资料集的编辑，内容仍然以南洋研究为主，但也涵盖了传统中医药书籍的编辑。第三项则为诗文方面的编辑工作，除了替友人整理出版回忆录、诗文集、遗墨目录册，他自己本身也分别整理出版了两本诗文创作。其中《浮云集》是他南来前，于姑苏家乡由苏州怡文书局出版的早年诗文创作；而《希夷室文集》则是他在晚年集辑出版的。临终前，还为《文心雕虫续集》付印的事忙了一阵，这也是他学术生涯里最后的一本著述。

3. 专著文章的译介

朱杰勤曾谓：“许先生的汉文基础十分牢固，行文流畅。他能用英文写作，同日本、暹罗及马来各种文字。”³⁷由于许云樵精通中英巫以及暹文等数国语文，悠游其间，使之译述了不少著述，将之转换成华文，介绍于马新学术界。许云樵的译述主要以单篇论文和文章为主，专书的翻译则较少。许云樵在南洋研究上的处女作《暹罗王郑昭传》即是一部蜚驰内外的译作。此书乃许云樵转译暹人朗苇吉怀根(Luang Vicit Vadakar)所著之《世界史纲》(Pravasat Sakor)第7卷之第10及11章，他将第11章一分为二，故全书共3篇，上篇为〈六国争雄记〉；中篇为〈拓地功业记〉；下篇为〈病癲遇弑记〉，末附先生之注释78则。此外，他于书前写有一长13页之弁言，根据中英暹载籍，详考郑王身世，并指正原著者言论之歪曲，可补原书之不足。在此之前他已对暹罗历史上的传奇人物郑昭作了不少研究的工作，他认为此此书提要钩玄，叙事明晰，并且其中有很多的史料为一般暹史所隐蔽不敢说，例如：“郑昭晚年致疯的原因，大家都以为沉迷佛事过甚所致，他却告诉我们实在为了两个皇妃的缘故。”所以将之译成中文行世。³⁸

战后，许云樵服务于南洋书局，这时他开始着手进行好一些有关南洋研究著述和文献资料的翻译和注解。1946年的《佛罗利氏航海记》即其一。此书的作者佛罗利氏(Floris)是荷兰人，通晓荷、英及巫文，17世纪初任职于英国东印度公司，他于1611年初奉命随“环球号”(Globe)作第7次航行，此行的目的在于开辟北大年为重要的贸易站。作者遍历印度、爪哇、柔佛、北大年、暹罗和缅甸等地，将各国的见闻写成航海记。此书对南洋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将英译本转译为中文，并加上注译，以供同好。

当然，在这些译述中又以《马来纪年》的翻译最为学界乐道，数十年来，学界引用此书，皆以许云樵的译本为参考。《马来纪年》的翻译开始于1946年，他是以连载的方式，将其译稿陆陆续续发表于《南洋杂志》，总共刊载了16期，并于战后至1960年代分别由新加坡南洋报社有限公司和青年书局印行出版单行本。此书是依据1821年印行的莱顿(John Leyden)英译本转译，同时也参考各种版本之注释，在书前有一长达59页的导言，并将莱佛士手稿第18号之马来文本以及希勒别(W. G. Shellabear)的马来文罗马字本，作逐章之简明提要，译文精简扼要是其优点，是马新本土学人迄今唯一的译本。通过此书，让华人可以很好的了解马来人之历史文化。

许云樵任职南大期间，于椰阴馆处向陈育崧惠借日本学者岩村成允之《

36 许云樵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之〈代序〉和〈出版缘由〉，页i—iii。

37 朱杰勤，〈许云樵与东南亚研究〉，页74。

安南通史》，并将之转译为中文。此书的译述是有见于中印半岛三国的通史著述，缅甸有姚楠所翻译的哈威（G. H. Harvey）《缅甸史》，暹罗有陈礼颂所翻译的吴迪（W. A. R. Wood）《暹罗史》，而唯独越南没有相关的译著。在这领域的研究要数法国远东博古院的研究最为权威，日本亦卓有成效，岩村成允的《安南通史》即为其中之一，故许云樵将之译出以补缺憾。³⁹

1961年，许云樵也完成了《黄金半岛题本》的译述。此书乃16世纪葡人伊利地亚（M. G. de Eredia）提奏于葡王之报告，故曰题本，内容详述黄金岛各地之风土，乃欧人最早最著之南洋文献。⁴⁰此书内容虽属光怪陆离，但却是欧人详述南洋风土之第一专书，⁴¹故将之转译以为研究南洋历史地理之参考，于书前附有一文介绍此书之书名、作者、著述目的和传刊情况，并针对内文进行了一番的考订和校注。

在1969年，许云樵接受德国Horst Erdmon出版社的委托，译述著名科学作家文功拉查(Egon Larsem)所著的《世界发明史》一书为中文版本，以便在东南亚发行。许云樵前后共花了两年的光景才将之译完，并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他在中文版书前的〈译者赘言〉中说其译述目的：“我既非工程师，又非科学家，如何能译述科技发明的专史，似乎有些不自量力……译起来的的确确很不容易。”但是为了“此间政府(新加坡)极力提倡科技教育，然而坊间像这样轻松而全面的科技书，简直没有，应该是极为需要的一本。”这是许云樵晚年在译介工作上的大手笔。

4. 文献史料的校注、辑佚和考证

除了上述几部专著的翻译，许云樵另有总数不下数十篇长短不一的外文译著。从内容上来看，主要以南洋研究为主，旁及橡胶、医药和科学数类；从性质上来看，有者属著述，有者属文献资料。针对文献资料的翻译，许云樵通常都会对某些名词词汇进行考证校注，以利读者的阅读。这又涉及了许云樵在学术研究上另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对文献和史料的校注和辑佚。这方面的工作，不论中文或外文古籍，他皆有涉及。对外文资料的注释主要是伴随着翻译而来，如《黄金半岛题本》译注、〈百夷国译语注〉、〈占城译语注〉、〈满刺加国译语注〉、〈《宋卡记年》译注〉、〈郑昭贡诗人朝中国纪行译注〉等等皆是。中文资料方面的校注则有《新加坡风土志》、《徐衷南方草物状辑注》、《开吧历代史记校注》、《康泰吴时外国传辑注》、《瀛崖胜览校注拾遗》等等。

38 许云樵译，《暹罗王郑昭传》，北京：中华书局，1955，页1。

39 许云樵，〈译者序〉，岩村成允，《安南通史》，新加坡：世界书局，1957，页4。

许云樵对郑和的研究亦颇下功夫，除了相关著述，也进行原始资料的点校。郑和研究的原始资料除了较广为人知的《郑和航海图》、《星槎胜览》、《瀛崖胜览》、《西洋番国志》等书外，值得注意的另有《西洋朝贡典录》、《东西洋考》、《殊域周咨录》、《咸宾录》、《两种海岛针经》。另外，别有二书同为郑和史事珍贵之文献，亦值参考，即《三宝太监下西洋通俗演义》、《奉天命三宝下西洋》杂剧（简称《下西洋》）。其中《下西洋》一书向无刊本，原为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居》第76本所收。许云樵考证此书成于明万历四十三年以前，并将之校点笺疏，付刊问世。该书被列入《南洋袖珍丛书》之六，于1962年，由新加坡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⁴²

在中文资料方面除了校注，也作了好一些辑佚和整理的工作。这可分成两方面来看，首先是古籍文献中有关南洋研究史料的辑佚。除了上述《徐衷南方草物状辑注》、《康泰吴时外国传辑注》二书外，亦有〈永乐大典中的南海资料〉、〈《华夷通商考》中的南洋资料〉、〈《太清金液神丹经》中的南海资料〉等等。其次是有关南洋研究书目的整理，其中《南洋文献叙录长编》、《南洋文献叙录续编》最为人称道，其他有〈清代南洋文献叙录〉、〈星期六对南洋研究的贡献〉、〈1958年来星马华文报新年特刊内的南洋研究资料〉等等。

三国时代吴国之从事朱应、中郎康泰曾奉吕岱之命出使宣化南方诸国，经历百数十国，归国后有记述传世，是为《吴时外国传》，也称《扶南土俗传》可说是中国专门记述南洋专书中最古的一部地志书，史料价值颇高，可是此书宋朝以后已佚失，但仍可从宋朝的类书中找出佚文，作为考证之资用。历来学者曾有志于此书的辑佚工作，如向达、伯西和等，然未见刊布。此外，日本学人驹井义明曾略为钩稽，但是不免疏舛，考订亦多臆断。职是之故，许云樵就据历朝所引康泰著述之遗文整齐裒辑，并为之校点疏笺而成《康泰吴时外国传辑注》。⁴³这是目前辑佚较为详备和考证精当的辑本。

继此而外，许云樵晚年坚持校录《清实录》中的有关南洋研究的史料，以致左目突眇。这项极富意义的工作，最后因为身体状况不允许以及无人协助下而中途告吹，殊为可惜。

除了南洋研究资料的校注，他也在1979年，以其医学知识增注吴瑞甫医师的遗作《四时感症论》。

5. 诗文创作

40 许云樵译，《黄金半岛题本·内容提要》，新加坡：世界书局，1961。

41 许云樵译，《黄金半岛题本》，页6。

许云樵除了挑灯夜战，埋首故纸堆，进行繁冗琐碎的考据撰述，同时亦能进行感性的诗文歌赋的创作。从青少年开始他其实已经崭露了这方面的才华，他的第一本专著，并非史地的著述，反而是诗文创作《浮云集》。他在编辑《马来亚少年》时，以及在他的报章杂志，也写了不少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小说、故事、掌故等等儿童与青少年的文学作品。晚年，他出版《希夷室文集》，都属这方面的表现。

最后，在教科书本土化的过程中，许云樵亦曾贡献一分力量。他曾于1960年代编撰小学4年级历史教科书《马来亚近代史》（香港：教育出版社，1963），全书分22章，以马六甲王朝之创立开始，以迄战争后争取独立为止。同时，他的文章〈中国古籍中的马来亚〉被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印行的马来西亚华文中学第五学年下学年的华文课本选为教材文本之一，这套教材是遵照马来西亚教育部新颁课程标准而编订，并以1973年出版。自1950年代以来马新即积极的推动教科书本土化的运动，而许云樵这篇“略带考据性的记叙文”和“深入浅出的考据文章”，很清楚的透过对中国古籍的介绍来描述古代马来亚的历史，令人对马来亚古史一目了然。书中另有一文〈百多年前马来亚印象记〉是清朝商人谢清高以口述的方式将其对马来亚的印象纪录下来，此文是从《海录》一书中连缀吉兰丹、丁加奴、邦项、旧柔佛、麻六甲、新埠各条，再加节选而成的。可见许云樵的研究成果，还是受重视的，并且成为教育本邦学子马来西亚印象的教材之一。⁴⁴此外，他在1950年代，考证新加坡的最古名实为蒲罗中，后来这个观点被官方采用，并为新加坡政府年报、新加坡史诗以及一般历时教科书所采用。这个看法后来引来了新加坡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饶宗颐和陈育崧的驳斥，并因此引发一场笔墨大论战。这个论点是否正确，或许仍可商榷，但他的论点受到政府的重视，亦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二）对马来亚古史的建构

其次，他在建构马来亚古代史所作的努力。在马新华文源流的南洋研究领域，许云樵可谓是第一个在马来亚古史的建构上花大力气的学者。他于南来之初，即有志于为马来亚甚至东南亚建立一个完整的历史体系。那是因为有见于马来亚没有古代史，而编写马来亚史的学者只注重欧人东来以后的殖民史，那不过是不到五百年的近代史而已，一个国家如果只有史前史和近代史而无古代史和中世史，未免太不成话。他认为20世纪以来，虽有许多权威的学者进行马来亚史的研究，但除了温士德爵士（Sir R. O. Winstedt）外，竟无人能为马来亚编写一完整的历史体系。有见于此，他只好“廖化作先锋”，将其30年来

42 苏庆华，〈有关郑和研究的参考资料〉，载《亚洲文化》，26期，2002，页216-217。

43 载《南洋文摘》。第1卷，第11期，1960.11，页53；许云樵，《南洋史》，新加坡：世界书局，1961，页78、83；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香港：太平书局，1963，页16-18。

的点滴努力成果，编著一本草创的马来亚通史。⁴⁵《马来亚史》于1961年出版，与此同时，西方学者，即马来群岛古史地理研究权威维尔利（Paul Wheatley）亦正在进行马来半岛古史地理的研究，并于同年出版名著《黄金半岛：公元1500年以前马来半岛古史地理之研究》，⁴⁶两者同年出版可谓相互辉映。维尔利对许云樵在半岛古史的研究和成果，基本上持赏识和持肯定态度的。在《黄金半岛》一书的序言中，他特别提及许云樵所给予的帮助。在1964年出版的另一著述《古代马来半岛的痕迹》⁴⁷书前印上如下中英文字：“For Hsu Yun-Tsiao,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见其惺惺相惜之意。在此书前言论述这领域的近代学人时，首先介绍百兰登尔（Dato’ Sir Roland Braddell）和许云樵。在众多学人的介绍当中，又以他们二人所占笔墨较多，篇幅较长。

许云樵的《马来亚史》在马新华文源流相关的著述上，虽非第一部，但无疑却是第一部符合通史体例的学术著述。此书同时也是首部对马来亚古史进行详细论述的著作。此书虽然堆砌了大量的考证，但通过此书无疑可以让吾人对马六甲王朝以前的马来半岛至少有个较完整的了解和概念。在是书的古史地名考证，他大量阅览，综合诸家之说，在这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提出本身的论见。他有继承，亦有批判纠正。他将混乱纷扰，莫衷一是的中西载籍中有关的古史地名，以及诸家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考证论断中，清楚的厘清，并标明各列国的大略方位，以及各地名之间彼此的前后关系。将马六甲王朝以前的半岛古史重现，描绘了一幅较为完整的半岛古史，这在马新华文源流的南洋研究中可谓是第一人。

许云樵的古史地名考证常被人诟病为主观臆断，这或许不无商榷余地。针对此问题的讨论，首先必得对这门学科的特质有所了解，方能较切中的评论许云樵在古史地名考据是否皆主观臆断。古史地名的考据由于先天条件的限制，诸如古书的讹误、语焉不详、资料不全以及地名的转译因时代或中外理解上的差异而出现的歧异，再加上对音作为这门学科的其中一个重要治学方法，已经不免其主观成分的存在。这些不足，往往给予治学者带来了相当大的困扰，因此就常会产生滞碍难以解释的现象出现，甚至产生经过考订仍然莫衷一是的情况。因此这领域的研究就无可避免形成高争论性，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甚或主观臆测，人云亦云亦所难免；有者经过多年多人的研究考订，亦难有定论的亦不少概见。

44 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要旨〉，《华文（五下册）》，1968，页51-66。

45 许云樵，〈马来亚史研究〉，载《马来亚史》，新加坡：青年书局，1961，页1-8。在〈传疑时代的马来亚〉，许云樵亦有如下表述：“公元初年，文化较高的中印移民，既愈来愈多当地土著也自新石器时代逐渐进入金属器时代，社会组织自然也跟着一同进步，我们怎么能够说他们到五百年前才开始有历史呢？目前我们虽找不到他们自己的记载，但我们也不能武断，

虽然以对音作为古史地名研究的治学方法之一，其科学性颇受质疑，但除了对音，仍然需有其他研究方法的配合，诸如从地理方位来确认地名、根据航程风向来判断位置、依据风土人情或宗教文化来识别地望，以减低对音的主观性，并补其方法上的不足。由于先天条件的缺失以及研究方法无可避免的主观倾向，以致古史地名的考据，往往失之主观，这是学科本身内在存有的问题。同时，这也是所有治域外史地的学者都会碰上的问题，如果以此非议，甚至否定许云樵在这方面的努力，不免以偏概全。许云樵的考订基本上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批判的继承，并且能有所创见。如他发现了从明代开始，淳尼和大泥相混，并将之抉出，加以区别，还原大泥为北大年；⁴⁸此外也考订丹丹为吉兰丹；⁴⁹赤土为宋卡等皆是。⁵⁰历来的汉学家，如伯西和、藤田丰八、祈利尼和柔克义等学者，他们所考证可谓得失互见，许云樵也莫不如此，是得是失，仍有待深论。⁵¹

（三）培育后进

最后，可以附带一提的是许云樵对后进的培育、鼓励和协助。许云樵在南大和义安任教的时日不长，却也培育、启发并影响不少学生和后进走上东南亚史研究之路。程光裕谓：“任教南大时开南洋史和马来亚史课程，启迪学生，出其门者，多有杰出表现。”⁵²此外，他也对许多来求助的协助和指导。下面我们转引其学生及受其协助之学人的忆述来证明之。

东南亚华人史著名学人颜清滢说：“1959年我与许教授的关系趋于密切。那年他曾召集一些对南洋研究有兴趣的史地系同学参加南洋研究室，分组进行讨论研究。当时我被选为总务，与他常有接触。那时他正着手筹备出版研究室的期刊《南洋研究》。在他的影响下，我对马来亚史的兴趣渐浓。”⁵³吴振强曾谓：“早年设在南大由许云樵主持的‘南洋研究室’。更掀起许多年轻的学子向南洋研究的领域进军。”⁵⁴此语所言非虚。新加坡学人柯木林说：“这本书以轻松的笔调，撰述新马华人史迹，可读性甚高。无可否认的，《马来亚丛谈》引导我进入新马华族史的研究领域。”⁵⁵又谓：“1970年中，为了撰写〈新加坡

他们从来没有过记载。即使他们从来没有记载过，我们不妨从历史悠久的邻国史籍中，去找寻已为人类遗忘的史实。现在就有人从事这样有意义的工作。根据学者从中文、梵文、淡弥尔文、阿刺伯文、西腊文等古书中探究考证，为马来亚发掘出来的不少珍贵资料，正可以用来填充这一千五百年间的空白历史。自然这些资料未必完全可信，但经过许多权威学者考证过的史料，不妨先予推受，以后再详加研究。这样，我们才能把马来亚残缺不全的历史体系建设起来。”详见氏著，《马来亚丛谈》，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页8-9。

46 Paul Wheatley, *The Golden Khersonese: 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Malay Peninsula Before A.D. 1500*,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1.

47 Paul Wheatley, *Impressions of Malay Peninsula in Ancient Times*, Singapore: Pub. by Donald Moore for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64, p.6.

侨汇与民信业》的毕业论文而走访许教授……当时，我正苦于民信业的资料繁杂，不知如何下笔。可是经他一语道破，加强了我完成论文的信心。他说：‘你的论文，可以做到保存史料的价值。’他还任由我翻阅案上与书架的藏书，如果有需要还可外借呢！”⁵⁴吴振强则记述：“当我在写论文的时候，许教授曾来信说，他在整理客家人的史料过程，发现目前还没有人进行客家人在东南亚的移民史研究。他建议说，如果我的题目还没有决定，不妨在这个范围加以考虑，而且说客家人研究客家的历史再恰当不过。那时候，我已选定了《厦门的兴起和闽南人的海上贸易》为研究题目。不过，内心却是十分感激他对学生的关怀。”⁵⁶

即使学生毕业后许云樵仍然不忘鼓励他们。杨进发回忆道：“《石叻古迹》的作者们，每月有一次的午宴，在席中，许教授常不忘相告其研究方向与成绩，并积极鼓励同学们不断写作与发表。”⁵⁷李业霖回忆说：“记得三年前(1978)，许老师赴泰国，路经吉隆坡，我们在苏丹街上邂逅……他面容清癯，虽有点老态，但精神还好……他告诉我东海岸各州华人甲必丹的史实，至今未有人作过研究，他鼓励我开拓这个史学研究的新天地。”⁵⁸在许云樵的积极推动下，南大逐渐建立起研究东南亚的风气，许云樵有几个得意的门生，如颜清湟与杨

48 许云樵〈大泥考〉，载《星洲日报·南洋文化》，1940年6月。

49 许云樵〈丹丹考〉，载《南洋学报》，第一卷，第一期，1940年6月，页13-23。

50 许云樵〈赤土国考〉，载《南洋学报》，第二卷，第三期，1941年9月，页1-9。

51 由于此问题牵涉颇广，非三言两语能道尽，若揉入析论则有离题之失，这里仅举数例以概其余，往后当以专文处理之。南洋古史地名考据常常会出现两种结果，其一是争论性高，各持己见，相持不下，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最后是众说纷呈，莫衷一是。如都元主要有故地在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二说。主马来半岛说的，又有马来西亚的吉打(Kedah)、瓜拉龙运(Kuala Dungun)、泰国的北大年(Patani)、洛坤(Nakhon Srithamarat)、克拉(Kra)、地峡以北的Htayan及马六甲海峡东口北岸等不同地点。主苏门答腊岛说的多认为在该岛东北岸，但一说位巴塞(Basei)河口一带，一说又作覃(口部)、淡洋、毡阳，在塔米安(Tamiang)河流域。兹再举顿逊为例：故地在今马来半岛，一般认为指缅甸东南岸的丹那沙林(Tenasserim)一带。一说在泰国的洛坤附近，即童颂(Tung Song)一名的译音。也有的认为泛指马来半岛的北部。此外尚有马来西亚的马六甲(Malacca)、柔佛(Johore)及新加坡等说。(以上详见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北京：中华书局，2002))其二是主观臆测难免，甚至人云亦云。如：樊绰《蛮书》卷六有“勃泥”一名，伯希和(P. Pelliot)误作“渤泥”，以致夏德(Hirth)、柔克义(W. W. Rockhill)、藤田、冯承钧等人皆随之而误。(汪大渊著、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150-151。)兹再举真腊为例，此名之来源，有多种推测，施古德(G. Schlegel)将之还原为Tchanda帕克(E. H. Parker)认为出自今柬埔寨的暹粒(Siem-reap)，苏继庠主张为Khmer之讹转，伯西和并谓中国载籍有真腊改国名曰占腊。夏鼐则驳斥苏继庠“讹转”之说以及伯西和“改名”之论为臆测。(周达观著、夏鼐校注，《真腊风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17-18。)面对古史地名研究资料不足的问题，即使是伯西和等人亦不免遭人非议为“臆测”，许多地名的考据亦各师其说，难有定论，若据此而谓许云樵主观臆测，则其他治古史地名之学

进发等人，秉承了许云樵苦学的钻研精神，在学术上树立了辉煌的成就。⁵⁹

除了及门学生，对于有志于南洋研究的学人，他都会给予积极的鼓励和协助。程光裕说：“70年代初，我就开始研究中国通俗小说中的马来文译本发展史。对这个课题，许先生也给我很多指示，他一面助我找出原文的书名，另一面也引起我注意到泰国的类似翻译的潮流。”⁶⁰东马砂拉越史著名的研究学人刘子政回忆说，他之所以专心致力于砂拉越史实的发掘和研究，主要是许云樵鼓励的结果。1956年，刘子政的《砂劳越百年记略》在付梓之前，曾将其在古晋《中华日报》发表的完整剪报寄给许云樵，请求赐序、题签并修改书稿，他皆一一照办。1960年5月，许云樵组织编印《亚非丛刊》，特约刘子政编写《砂罗越散记》，作为丛书的一部分。三个月后书成，成为大学史地系学生采用的参考资料，使刘子政的声名大噪。许云樵也为此书作序，并于文中呼吁有识之士挖掘和收集砂拉越的史料。1979年，许云樵协助刘子政即将出版的新书《黄乃裳与新福州》编排图片，并且为之作序。⁶¹此外，苏尔梦说：“1970年代初期，苏尔梦在进行翻译和校注孙敏堂丛书所收的噶喇吧纪略，碰到困难时便向许云樵就教，许云樵总会孜孜不倦的为他一一解答。”⁶²

四、结论

清代学人龚自珍曾谓：“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以这句话来形容许云樵在学术上的多面性，庶几当之。许云樵的治学范围即广博又精深，他除了能写精深的学术论文，亦能以生花妙笔书写通俗的文章，可谓通俗与学术兼备。他学术研究范围，约略有如下数项：马新史、暹罗史、华人史、音韵语言、传统医药、史学与文献学、民俗宗教、南洋史地等等，不一而足。除了著述，他亦擅长于编辑、翻译和注辑，可谓编译著注四项皆能。再者，他亦能文攻诗，写了不少诗文传世。他除了本身勤于著述发表，主持出版，也透过创办学术团体来推动和鼓励，建立了南洋研究的学术传统。

吴振强曾就许云樵在马新学术研究上的贡献作了如下的评述：“在这半个世纪，形成了一个由本地人以华文为主要写作媒介的‘南洋研究源流’。这

52 程光裕，〈悼念史学家许云樵先生〉，载《南洋学报》，第37卷，第1、2期，1982，页21。

53 颜清煌，〈悼念吾师许云樵教授〉，页49。

54 吴振强，〈悼念许云樵老师〉，页47。

55 柯木林，〈记许云樵教授〉，页42-43。

56 吴振强，〈悼念许云樵老师〉，页48。

57 杨进发，〈忆吾师许云樵教授〉，载《南洋学报》，第37卷，第1、2期，页40。

58 李业霖，〈欲祭疑师在天涯哭此时——悼念许云樵教授〉，载《南洋学报》，第37卷，第1、2期，页35-36。

个源流的发展，许教授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尤其是在《南洋学报》出版的首20年，这个源流在学术上所作的努力，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⁶³南洋研究这支在中国南方异军突起的学术支流，滥觞于1930年代，源头可上溯至清末以来之边疆史地学以及其所派衍出来的中外交通史，当时的南洋华侨及史地研究为中外交通史的一支，独立出来后成为所谓的南洋或东南亚研究。⁶⁴经过南来和本土学者的耕耘，曾经蓬勃发展，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即为许云樵。

他对南洋研究传统的树立和积极推动，环顾与之同时代的学人，实是无人可出其右。他对南洋研究的推动和鼓励，可以如下九字来概括：勤著述、出期刊、办学会。著述方面，据《许云樵全集》编辑委员会的初步收集所得，不论是学术或通俗、长篇或短文，供得四百余篇。约略可归纳为史学专著、古史考辨、史地掌故、宗教民俗、音韵语言、文献辑注、传统医药、杂著和华侨华人华报华社等、政治经济社会、人物评论和书评、外文译述和其他共十三大类。专书方面，扣除与论文重复者，亦得约二十余种。⁶⁵期刊杂志主持出版方面，他曾经搞过出版社，出版南洋研究相关的出版品，但他真正下功夫，颇著贡献的是各类期刊杂志丛书的编辑出版，如《南洋学报》、《南洋杂志》、《马来亚少年报》、《南洋珍本文献》、《南洋研究》、《亚非丛书》、《东南亚研究》等等皆是。学会研究机构的创设方面，计有战前创办的南洋学会，南洋大学的南洋研究室，以及往后孤身上路的东南亚研究所。而东南亚研究所也是他个人的藏书处，由于他嗜书如命，毕生皆在搜集和收藏有关南洋研究的著述和资料，并将之收藏于其居处自设的东南亚研究所，名之曰“万卷楼”，寓意藏书万卷。其所收藏的图书遍及各种语文，有中、日、英、法、暹、越、巫、印图书约三万卷，程光裕誉之为“民间独立学者收集南洋研究资料之巨子”。⁶⁶

很明显的，他企图通过学术著述和学术活动两个大方面来促进南洋研究，在马新学界有此大魄力，亦如此大面积来推动学术研究的，看来除他以外，不作第二人想。此外，他也尝试以考据的实证方法来建构马来亚的古代史，尽量整理出古史的轮廓，使远古史不致渺不可及。最后他也透过鼓励和培育后进，使马新的华文源流的南洋研究后继有人。如斯的成就和贡献，与他的勤勉治学和热爱民族国家的精神不无关系，两者互为表里。

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没有许云樵，马新的学术界不知要失却多少光彩和魅力。没有许云樵，整个20世纪的马新南洋研究也不知要留下几许遗憾和空

59 崔贵强，〈许云樵：学识渊博的史学家〉，页138。

60 苏尔梦，〈悼念亲爱的许云樵先生〉，页23。

61 詹冠群，〈刘子政与砂劳越史研究〉，砂劳越：砂华文化协会，1998，页不详；刘子政，〈许云樵教授与我〉，载《南洋学报》，第37卷，第1、2期，页44。

62 苏尔梦，〈悼念亲爱的许云樵先生〉，页22。

白。如果将20世纪马新华文源流的史学发展进行分期，并将许云樵的史学研究活动放入这个脉络里来观察，则他的重要性和贡献就昭然若揭了。在第一期之滥觞期，他已开始东南亚史的研究和著述，除了完成《暹罗王郑昭传》的翻译，也撰成《北大年史》一书，同时也在《星洲日报》的副刊发表译著。在第二期之开创期，南洋学会创立，他是创办人之一，同时亦积极推动会务，并且在《南洋学报》上发表大量作品；此外，他亦负责主编《马来亚少年》和《南洋杂志》两份刊物，尤其是《马来亚少年》陪伴了当时许多少儿们的成长，为他们提供了精神粮食，也推动时下年青人积极参与文史研究的工作，对文史风气的催化起了一定的作用。⁶⁷在第三期之高峰期，南大历史系成立后他执教其中，创作旺盛，这时期也出版了好几部掷地有声的马新史学论著。虽然他任教时间不长，但作育英才，培育和影响了不少的东南亚史研究人才，⁶⁸而这批学生后来成为“华人研究”期的中坚分子。在1970年以后马新史学研究的转型期，他继续努力不懈于他的南洋史学研究工作，并创刊出版了《东南亚研究》期刊。在每一个不同的时期里他都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并有所贡献，甚至在其身后仍然继续影响马新华文源流马新史学之发展。⁶⁹

1981年许云樵的离世，或许可以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⁷⁰因为由许云樵这一辈学人所建立起来的“南洋研究”传统至此中辍，出现了断层。1980年以来马新华人的南洋史学研究已窄化至华人研究和与之相关的专史的研究。他生前的努力以及身后留下庞大的文字遗产，似乎在马新的学术界并没有泛起太大的涟漪，这或许是他的研究领域与当代的学术关怀有相当落差所致。他所提倡的南洋研究传统对1980年代以来的学术界，实已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他所进行的一些研究领域至今可说后无来者，知音杳绝，例如：暹罗史、音韵语言学、东南亚古史地理考证等等。现今的学人已不做此顾，而将兴趣转至华人史研究上面。也或许与他所据以治学的实证考据方法和当代转重诠释梳理杆格不入所致。专务考史的风气在20世纪的下半期在学术界已逐渐退色，渐行渐远，不再是学界宠儿，以侧重诠释取向的史观学派渐居主流。但是无论如何在马新华文源流的学术研究领域内，他的贡献仍然是值得提出讨论，并且也应该作更深更广的探讨。

63 吴振强，〈悼念许云樵老师〉，页46。

64 廖文辉，〈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20世纪马新华文源流马新史学发展分期刍论〉，载《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第六期，2003，页73-76。

65 此数据乃据《许云樵全集》编辑委员会整理之许云樵著述分类目录（第十稿）而得。

66 程光裕，〈悼念史学家许云樵先生〉，页21。这批藏书在许云樵贫病交加的晚年以15万脱手出让于木材商人许木荣，后来辗转收存于新加坡宗乡会馆。

-
- 67 马汉,〈陪伴我们成长的少儿刊物〉,《南洋商报·商余》,2003.04.18。曾松华(梅井)是其中一个受其影响文史工作者。他在接受《星洲日报》采访时说:“当我在读小学刚毕业的时候,就接触到新加坡出版的《马来亚少年》,对象主要是学校少年。这本杂志的编辑,就是南洋研究专家许云樵,里头刊登很多他到东南亚一带访问的报导。它的内容很丰富、有趣味,有关文艺、民俗、地理、历史等,并有两版是专门让学生写作练习。那时曾尝试投稿,获登一两篇后,就开始对人文、地理、历史性质杂志产生更大兴趣。”见《星洲日报·星洲广场》,2002.01.27。
- 68 在〈从“南洋研究”说起〉一文中,许云樵如此写道:“笔者在南大主持南洋研究室时,主张培植新血,使南洋研究得以发扬光大,万古长青。”见氏编,《东南亚研究》,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1968,第四卷,页95。
- 69 详见廖文辉,〈试论许云樵在马新史学的地位与局限〉,载何国忠编,《百年回眸:马华文化与教育》,页145-151。

